



染厂今昔

——上海恒丰印染厂史话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染 厂 今 昔

——上海恒丰印染厂史話

恒丰印染厂厂史編写組編写

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

1966年

染 厂 今 昔

——上海恒丰印染厂史话

恒丰印染厂厂史编写组编写

*

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 海 紹 興 路 54 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01 号

大众文化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 1/2 字数 24,000

1966 年 6 月第 1 版 196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—20,000

统一书号：11074·365 定价：(六) 0.12 元

目 录

王大班的血腥发家史	1
四只染缸起家	1
“若要发,工人头上刮!”	3
无所不用其极的搜刮手段	6
“烂污恒丰”	9
染缸底下	15
苦难的工人生活	15
折磨工人的牢狱	19
几个悲痛的故事	24
那里有压迫,那里就有反抗	27
新生	34
斗争中前进	34
厂史上新的一页	38
不忘阶级苦,奋发图强争上游	39

王大班的血腥发家史

四只染缸起家

上海恒丰印染厂已经有近四十多年的历史了。这厂早年开设在宁波，老板姓王，原是宁波江东百丈街一家“裕成棉布店”的小职员。此人为人机灵圆滑，跑钱庄拆头寸（指钞票）很有办法，又有一套投机本事，所以很得布店老板的赏识，不久就被提升为阿大（即经理）。这家布店是以批发“洋布”为主要业务，买卖兴隆，很赚了些钱。可是，钱赚得再多，也只能鼓起布店老板的钱袋，他姓王的并没有多少油水可得，因此他一心想要单独开创新的天地。

他是吃棉布饭的，看到机器织染的进口布销路好，又深知那时的三只缸——染缸、酱缸和酒缸利润厚，尤其是那染缸，有“染糊涂”之称，最能赚钱。因此他决定要办个染织厂。

他自己当时并没有多少钱，只是利用职务上的方便以及在商场中的地位，从“裕成”那里挪动一点款子作为股本，又向其他布店老板和钱庄老板拉了些股子，共拼凑了一万多元，对外说是一万五千元。一九二九年，他在宁波南郊路永春巷内

找到一家关了门的毛巾厂，租下几间破烂的厂房，买了四只鉛皮染缸和其他輔助机器，又买了脚踏木布机三十二台（投入生产的只有二十三台）、經紗架一台，雇用六十多个职工，开始了生产。厂名定为“宁波恒丰机器染織厂”。他从此由一个布店的小职员，变成了工厂老板，人們称他“王大班”。

这个所謂机器染織厂，开始只能生产“海昌蓝布”“玄色洋紗”等几种色布，每天产量在四百匹左右。当时宁波地方还只有土法染坊和手工布机，这另新开的机器染織厂赚了很多錢。年年得利，逗引得王大班发财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了。

王大班羡慕花布的利潤，可是办机器印花，力量还不够，于是先办了个手工印花车间。花布一出，果然銷路很好，利潤也厚，赚了一大笔鈔票。一九三一年，他增加了股本，又向銀行貸款，亲自帶工程师到日本去訂购了印花机回来。正准备“大展宏图”，却沒料到从一九二九年就已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經濟危机，这时波及到中国，外国商品潮水般涌来，使建厂不久的恒丰染織厂，产品推銷不出，資金攔浅，負債累累。王大班看势头不对，就宣告倒厂，并对其他股东說：“厂倒了，机器拍卖没人要，倘使債主逼得紧，将来怕大家还得拿錢来贖身呢！”經他这么一吓，一些胆小的股东都害怕了，情愿把股份錢让出来也要退股。王大班乘这机会，来了个“秦并六国”，廉价把大部分股份收到他自己名下。等經濟危机一过，马上又开始了生产。

当时宁波厂里用的原料、材料等，都必须从上海购买，大部分产品又必須运往上海，来往既需時間，又要運費，很划不

来，王大班因此决定来上海扩办新厂。

一九三五年，王大班到上海来筹划开厂，租到了马浪路（现在的马当路）上一处旧厂房，还连带租下了隔壁弄堂里十八幢破烂不堪的木板房，作为工人宿舍，又向机器厂定制了印花机。至于工人，一部分是连哄带骗从宁波拉过来的，一部分是从泰兴、常州等地招来的，共有三百多人。一九三八年，王大班就这样又在上海搞起了个恒丰印染厂，它比起宁波厂来，资本和规模都大得多。

一九四五年，王大班增加资本，组织“宁波恒丰印染厂股份有限公司”（其中他的股份占七、八成），除了原来的宁波、上海两个厂外，这时又开办了恒丰织布工厂、永乐织布厂、新兴雕刻厂，共五个企业。有印花机四台，染色机六十台，织布机六百多台，还有其他许多辅助机器设备。到上海解放时，资本总额已达一百九十万元之巨（合现在人民币）。二十多年间，被王大班挥霍浪费了多少钱财，已经无法计算，仅就资本来说，比原来就增加近两百倍！

“若要发，工人头上刮！”

在短短二十年里，王大班由四只染缸发展到五爿工厂，聚敛了巨大的财富，成了一个拥资巨万的富翁。并不是他有什么魔术师的能耐，说穿了，也没有什么奇妙的地方。资本家都有这样一句“名言”：“若要发，工人头上刮！”王大班发家的全部诀窍，也都在“搜刮工人”这四个字里边。

从宁波办厂的一天起，王大班就无时无刻不在工人头上打算盘。为了少开销工资、多赚钱，他从不雇足工人，而是迫使一个人顶几个人用。如象这样大的染缸间，每天要染三、四百匹布，满打满算才用了五个工人，让他们整天忙得不可开交，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。王大班只想省钱，所买的机器全是破烂旧货，毛病很多，要不断地修理，两三个人也难侍弄得过来。可是王大班只雇一个修理工，厂里全部机器的大小修理，都由这一个人包。总是顾了修这边就顾不了修那边，这里还没有弄好，那里就已经在停工待修了。修理得稍慢一点，王大班就说耽误了生产，叫着嚷着要扣工资，要停生意。修理工整天手脚不停，连吃饭、大小便也挤不出时间，长年累得头晕眼花，四肢酸痛。

工人就这样没死没活地给王大班干活，可是每到发工资，王大班却象割肉一样心疼。有时王大班到厂里来，正碰上帐房在发工资，看到工人拿了些钞票去，总是气得满脸发紫，恶狠狠地低声咒骂：“娘希匹，钞票都被他们拿光了！娘希匹……”帐房里的人渐渐摸出了他的脾气，后来当他在厂的时候不敢再发工资，总要等他走出厂去才发。

到底是誰把钞票拿光了？工人到底拿去了多少呢？

根据一九四七年八月的材料，当时这厂每天获得的利润在伪法币一亿元以上，能买大米二百二十九石。而全厂职工三百九十多人，每月工资总数只合伪法币五亿六千多元，每天只有两千万元左右，这点钱连四十四石米都买不到。

王大班的利润如此之厚，那么我们来看看工人的收入怎

样呢？

当时厂里长期工(有技术和手艺的工人)、临时工(普通工人)、試用工三大类工人中，长期工的工資每日底薪一元五角到二元左右，临时工的底薪五角到一元左右，試用工的底薪仅三、四角之数，底薪每元按当月伪政府公布的生活指数牌价結算发給。全厂工人中，只有极少几个长期工，多数都是临时工或試用工。这样，資本家可以减少工資支出、增加利潤收入了。占全厂工人大多数的普通工人，每天工資就算他一元吧，按当时的生活指数計算，只能买一升多点米，約合市秤一斤半不到，只糊过了自己的一张嘴，其他生活費用都沒有着落。这还是中档工資的普通工人呢，至于下档工資的試用工，連自己的一张嘴还糊不过去，只能半饥不飽地过日子。

全体职工每天工資伪法币二千万元，这一点錢工人只消一个半小时的时间，就能生产出来，工人一天要做十几小时的工，其余时间生产出来大量的財富，全都被資本家剝削去了。这是一种多么残酷的剝削！

王大班他們除了拿去全部利潤外，还以总經理、經理、协理、厂长的名义，在工資里大捞一把。他們每天的所謂“工資”，是二百八十四万元。所以資本家每天的总利潤(包括純利、“工資”、拆息)达一亿四千七百多万元，比全厂三百九十多名职工工資总数的七倍还要多！

以上只是几項可以計算得出来的数字，实际上資本家到底賺了多少錢，是很难算清的。因为他們掩盖剝削的真相，在数字上故意布置迷魂陣，帳外有帳，或是根本不入帳；还把管

理生产的人員和管理財務的人員分开，使他們互不通风，互不了解实情。王大班有次对他的帳房說：“你如能算清楚我的帳，我把厂都送給你！”

显然，不是工人拿光了王大班的鈔票，而是王大班残酷地剝削工人大量劳动成果，他的万貫家財都是工人的血汗。

无所不用其极的搜刮手段

資本家在尽量加强工人劳动强度的同时，还千方百計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時間。王大班虽在名义上规定工人每天劳动十二小时，实际上远远不止于此。如炉子間里，开始只有两个司炉工人，分成昼夜两班。炉子不能停火，每个月还必须清一次灰。每到清炉灰的时候，就要把另一个小炉子生起来，这边烧火，那边清灰，人手不够，两个司炉工只好同时連續劳动四十八小时。这就是司炉工人每月一次的“特长班头”。

还在宁波建厂的初期，王大班就实行一种“酒錢”制度，用来延长工人的劳动時間。按照他的规定，工人每天劳动十二小时以后，如果再繼續加班加点，沒有固定的加班費，只是每多生产一匹布就給八分錢，让工人們根据技术的高低，按份分配。王大班給这錢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做“酒錢”，意思是說，工人劳动完了可以用这錢去喝几两酒松松心。其实，这是騙人的鬼話。工人每天的工資那么少，連肚子还吃不飽，好容易得点“酒錢”，又怎么能去买酒喝呢？可是王大班却从中大撈了一把。如果按每次加班四小时，生产一百匹布来計

算，每匹色布的純利是一元三角，王大班一次就可以多賺一百三十元，而加班劳动的工人每人只得到一点点“酒錢”。王大班利用“酒錢”来刺激工人，还向工人大肆宣扬說，这是对工人的“关心”，是給工人的“特別照顾”，让工人更加拚命地替他卖力。

实际上，加班不加班根本由不得工人。当王大班要加班的时候，不加班的就要被停生意；工人为了得点“酒錢”，吃饱肚子，也不得不拖着疲劳不堪的身子，再多坚持几个小时。印染車間里的老师傅，几乎經常每天劳动十六、七个小时，甚至在劳动了十六、七个小时后，还只能让一部分人去稍微休息一下，其余的人連續干个双班——二十四小时。

到了抗日战爭以后，工人就連这点所謂“酒錢”也得不到了，王大班不再用那套“关心”工人、“照顾”工人的假面具，干脆强迫加班。

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初，国民党反动派全力打內战，物价飞涨，市场上物資非常缺乏，各种色布、花布一生产出来就被搶购一空。王大班为了赶着把大批次布以高价推銷出去，就强迫整裝車間的工人，每天晚上給他偷換商标，以次布充好布，加班到十一、二点钟。王大班起初連一点加班費也不給，后来經過工人斗争，才被迫答应每人給一碗阳春面！

王大班在雇用少数长期工人以外，大量雇用临时工、定期工、照顾工、試用工和学徒工等等，这也是他的生財之道。这些工人干的活不比长期工人少，工資却很低。临时工和定期工都有較短的时间限制，多則三个月，少則一星期，在生产旺

季招进来，淡季赶出去。有时甚至上午有活干时拉一把，下午沒活干了就踢一脚。有些人爲生活所迫，向王大班要求进厂，这时厂里即使真需要人，王大班也总是先說不需要，等他們进一步提出要求，才假装“照顾”，把他們收留下来，算作“照顾工”。这类工人一旦厂里沒有活干了，随时都得走路。当然，如果厂里不需要人，任你什么人也是得不到“照顾”的。至于“試用工”，顾名思义是对进厂工人的一种考察，看他能不能胜任某种工作。实际上却非如此。陈良荣老师傅是在宁波建厂的第二年（一九三〇年）进厂当司炉工的，直到一九四〇年厂里临时停工解散时为止，从未离开过炉子間。就是在他离开恒丰印染厂到別处工作的几年里，也一直和炉子打交道。可是，一九四七年他又回到恒丰印染厂的时候，王大班只让他当“試用工”，工資不到正式工人的一半，而且三个月重訂一次合同。直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，他还是“試用工”。說到学徒工就更惨了，他們名为学徒，实际上連一点技术也学不到，每天要比別人起得早，睡得迟，小小年紀尽做一些成年人也难以支持的事情，每个月仅仅得到一点剃头、洗澡的月規錢。学徒三年，只不过是給王大班白白打了三年杂。

王大班对不得不发給工人的一点工資，还要挖空心思地加以克扣，使他們难如数拿到手。抗日战争以前，王大班克扣工人工資的慣用手法是罰款。他訂下許多“厂規”来限制工人的行动，工人稍不注意，就被說成是触犯了“厂規”，强行罰款，真把工人害苦了。

抗日战争以后，物价飞涨，市場混乱，王大班要拿出更多

的鈔票去投机倒把，除了对工人罰款以外，克扣工人工資的花样就更多了。最簡便的办法，就是扣发工資。那时候，工人的工資只要迟发三天，本来可以买三斗米的錢，就只能买一斗多了。这样，只消扣住三天，工人工資被打了个对折。工人要求按时发工資，王大班还說什么：“皇帝的国庫还可以拖欠三天哩，莫說你們工人的工資了！”

王大班要迟发工資，工人起来坚决反对。王大班沒有办法，可又舍不得把鈔票按时发給工人，于是又要了个花招，用恒丰印染厂的“本票”来支付工資。本票是厂里印制、抵現金用的一种票据，只能在厂附近的马当路上使用，买东西时还要打八折。这种本票工人当然也不肯接受，王大班就装穷，說生意难做，亏空太重，厂里一点头寸也沒有，如果不要本票，就只好等到厂里有了头寸的时候再发工資了。工人一天拿不到錢就一天买不成米，全家都要餓肚皮，怎能久等呢？更何况物价飞涨，再等三天，一个月劳累的結果連一斗米也买不到了。沒办法，明知吃亏也就只好咬着牙齿把本票接受过来。

資本家搜刮工人的手段，就是这样无所不用其极！

“烂 污 恒 丰”

王大班不只是无情地搜刮厂內工人，还以敌貨冒国貨、以次貨充好貨，用种种投机取巧手段，欺騙和搜刮广大的消費者。只要发财，他什么事情都干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生以后，日本侵略者又进攻上海，发生

了“一·二八”事变，敌人节节进犯，激起了全国人民强烈的爱国热情，一个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，给了日货沉重的打击，日货进口顿减。人民群众争用国货，国货销路大畅，尤其是人民衣着所需的布匹，市场上的需要量更大，价格上涨。群众性的爱国运动，却被王大班利用来当成了发财的好机会。他眼明手快，抓紧这个时机，暗地里大量购进走私的日本棉布、棉纱，改头换面地作番加工之后，就在成品上贴上一张“完全国货”的招贴，冒充国货，向当地以及浙东、闽北、赣南推销，同时还把用廉价买进的有霉斑的坯布，染成色布，包装充数，发了一笔大财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王大班勾结日商走狗，大量购买日货“四君子牌”，把每一匹上的头子布剪下来，换上自己厂“金榜乐”的商标纸，再贴上一张“完全国货”的招贴，当成“恒丰印染厂出品”的“国货”，运销到浙东一带去。直到一九四二年敌伪收购棉纱时为止，王大班一直干着这种以敌货冒国货的可耻勾当。他还特地用三角钱一天的工钱，从乡下招来一批十二、三岁的童工，替他赶生活。他做贼心虚，害怕被人揭露了真相，每当印有敌货标志的头子布剪下，总要派人监督着连同包皮线一起，投进火炉里烧光不留痕迹。

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。由于抗战胜利带来了虚假繁荣，王大班在宁波和上海两地工厂的机器，都日夜不停地运转，产品销路很好。他又大施新的发财手腕了，把二厂所产的白布全部供给一厂印染，同时吩咐二厂从坯布中抽减经纱，每匹可以省纱三、四根，送到一厂印染加工时，幅门拉开又可伸长百分



資本家以敵貨冒國貨。

之七到十。二厂的坯布不够用，就采用常州、江阴等地布厂的土坯布。因为这些地方的小厂大都使用木机，坯布的組織比較松，在加工印染的过程中，每匹至少可以拉长百分之十以上，有时甚至达到百分之二十。代客加工，每匹是按三十碼交貨，伸长部分即归王大班所有。王大班每月代客加工四万匹，其中常州坯布要占一半，即二万匹。每匹平均按伸长百分之十五計算，那么一个月就有三千匹布滚进了他的腰包。这“利潤”之厚，岂不惊人！然而，买布的多数劳动人民，却吃了大亏。因为这种布一着水，原来被王大班拉长的部分，就又都收縮回去，一丈布只能剩下八尺多；如果把布买回来就做成衣服，那就更糟糕，穿几天、洗过一次以后，衣服变小、褲子变短，就再也不能穿了。

这两年里，王大班财运亨通，场子越拉越大，为了增加流动资金，他采用了抛售定貨的办法：一种花样的布尚未生产出来，就派营业员拿着样本到批发商号去兜售期貨。一般是以两个月到三个月为期，預收定銀五成到七成。恒丰厂当时每月大約有五、六万匹的定貨，以收五成定銀計算，凭空就給他增加了近三万匹布的资金，大可供买进坯布和染料之用了。他运用这样的公式：抛出——买进——再抛出——再买进，反复循环，越翻越大，利潤就滾滾而来。

王大班每月空抛大批定貨，实收大量定銀，在資金周轉上获得很大方便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大玩“偷工减料”、以次充好的鬼把戏。

那时候，印花布是三十碼一匹，每箱装四十四，花色一般

約分紅、醬、綠、深藍、淺藍、黑等六、七種顏色。其中用一、二種黑色，只不過搭配一下花色罷了。黑底花色的布用途狹，不很受歡迎，可是染料價格比較低，成本輕。王大班遇到染料漲價的時候，就吩咐車間，該用高檔染料的改用低檔；規定六、七種顏色的，干脆只用一、二種顏色，甚至改成禿黑色。成品裝箱出去，客戶收到後，打開木箱一看，不覺一吓，只見黑沉沉的一大捆，好象“包龍圖”的面孔，與定貨樣本完全不符。他們趕來交涉，王大班却冷冷地說：“貨色不好，退回來好了，自有人要，頂多退還定銀就是！”客戶見他如此耍無賴，恨得咬牙，但也沒辦法，因為再把定銀收回去，幣值已經大跌，就連這樣的布也買不到了。反正市上貨少，勞動人民不能不穿衣服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賣出去照樣能賺錢，於是收下。他們給這種花布起了個綽號，叫“包龍圖”。就這樣，恒豐印染廠的花布就以“包龍圖”出了名。

有一年的舊曆端陽節，市上有一種兒童們用的老虎布銷路很好，王大班一見就動了心，也生產了一大批所謂老虎布供應，並貼上“包不褪色”的招貼。但是，人們買去以後，只要洗一次，顏色就掉了，老虎變成了癩貓；再洗一次，癩貓也失了踪，只剩下黃不黃、綠不綠，花里八拉的一團糟。王大班“包不褪色”，實際上成了“色褪不包”。

那時裝潢部如果發現短缺碼份的布，工人要作零布處理，王大班見了把臉一沉，說：“吃我的飯，倒幫起外廂人做事來了！”強迫工人把二十九碼當三十碼打進包去。他還特地吩咐裝潢部不許有二、三等品出現，說誰定了三等品出來，就停誰